

史学新论

# 《努力周报》与新诗

沈毅

**【提要】**《努力周报》在论政的同时一直兼顾新诗的建设：扶持新人，发表多种题材、体裁和风格的诗作品，积极探讨新诗理论，重视译诗及歌谣的发掘。《努力周报》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

**【关键词】**《努力周报》 新诗 胡适 徐志摩 译诗 歌谣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1) 05-0115-05

《努力周报》(以下简称周报)1922年5月7日创刊,1923年10月21日终刊。创办的初衷是要批评北洋政府。尽管周报前期以政论为主,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一直盘桓于胡适的脑海。新诗、歌谣、小说及文学评论等在周报上是占有重要篇幅的。

## 一、新诗的新园地

1922年上半年几位诗人不约而同地感慨新诗园地冷清的局面。俞平伯在《〈冬夜〉·序》中感叹“诗坛空气太岑寂了”。<sup>①</sup>闻一多讥讽清华园旧诗泛滥:“于是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的唱开来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整个忘掉了。”<sup>②</sup>周作人对“消沉极了”的现状非常失望:“几个老诗人不知怎的都像晚秋的蝉一样,不大作声,而且叫时声音也很微弱……新进诗人,也不见得有人出来。……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的表示出来,因此根基并不十分稳固。”<sup>③</sup>感叹者大概关注的是1921年的情况,据统计,1920年出版的新诗集包括胡适《尝试集》在内共四本,1921年则仅有可怜的《大江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两本。1922年情况有了改观,共有12本诗集出版,包括汪静之、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各自集子,以及朱自清等人的合集。1923年进一步好转,冰心的《繁星》、《春水》及闻一多的《红烛》等计16本诗集出版。<sup>④</sup>但

周作人到了1922年10月似乎还觉压抑:“从南边来的朋友说,那里的中学生(中了他们的复辟派的国文教员的余毒)很欢迎胡寄尘金大白沈玄庐的(新)诗,以为与古诗相近所以有趣。……照这样看来,新诗的前途似乎很是渺茫了”。<sup>⑤</sup>

实际上周报新诗创作和讨论的势头是不错的。周报总计发行了75期,其副刊《读书杂志》(月刊)发行了18期,经笔者统计,刊登新诗、译诗、民谣及翻译民谣总计112首,其中新诗52首,译诗18首(均刊于周报),中外民谣42首(周报26首,《读书杂志》16首)。周报第75期胡适写给高一涵等人信,引用了他自己的新诗(收入《尝试后集》时名《梅树》),属首次刊布,故计入。民谣计入,是因为周报重视民谣与新诗创作的关系。<sup>70</sup>首中外诗作,从绝对数量来说当然不大,但周报毕竟仅发行一年半,平均每期0.93篇的发表频率不算低了,应该会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发表诗歌的周期不很固定,有的间隔十来期,也有时连续几期刊登

① 《俞平伯全集》(1),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扫描版),第13页。

② 《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③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④ 刘福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⑤ 《周作人散文全集》(2),第787页。

诗歌。每期篇数不尽一致,有时一首,而第23期发表7首之多。

## 二、新人与新风

周报的诗作(译)者除胡适以外,还有徐志摩、陈衡哲、胡思永、冯文炳、何植三、章洪熙、任鸿隽、周作人、罗家伦等。以篇数及行数排序,徐志摩、陈衡哲、胡适及胡思永应该排在前四名。胡适是诗坛的宿将,其他人有的诗名渐隆,有的还不大为世人所知,甚至是初出茅庐的新秀。徐志摩诗生涯的初起阶段刻有周报深深的印记是不消说的。徐正式写诗始于1921年,其时他在剑桥大学研究院学习,<sup>①</sup>康河的灵性和多彩的学习生活赋予了诗人灵感闸门的钥匙。周报不是徐志摩发表诗作的摇篮,却也接近这样的地位。根据韩石山编辑的《徐志摩全集》,1922年是徐诗创作的一个丰沛年份,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是九行短诗《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当年11月刊登于《新浙江报·新朋友》。<sup>②</sup>这家报纸论影响是比不上周报的。当年12月第33期、34期周报连载了徐的组诗《归国杂题》之《马赛》和《地中海》,是为已知徐公开发表的第二和第三首诗。第四、第五首诗是《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和《希望的埋葬》,也刊登在周报上。此后,周报和《晨报副镌》、《时事新报·学灯》共同成为徐诗的主要发表园地。徐在周报先后发表了10首诗。<sup>③</sup>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有人喊徐志摩“诗哲”,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志摩的诗》。徐志摩才华横溢,文思泉涌,笔下奔腾跳跃,但毕竟周报时期他也是个新手,也需要别人的扶持,而胡适就是非常看好他的人。胡适认为徐对诗“见解甚高,学力也好”,所以尽管认为有些作品与其“天才学力,殊不相称”,但仍寄予厚望。<sup>④</sup>徐志摩的诗固然为周报增辉不少,但周报同样让徐志摩名扬四方。冯文炳,刚跨入北京大学校门的新生,首次公开发表新诗《小孩》、《冬夜》,以及首篇公开发表的小说《长日》,都刊登于周报。<sup>⑤</sup>周报为冯文炳的作家梦勾画出最初的多彩之笔。胡思永是胡适的侄子,做诗的天分很高,只可惜先天性结核病夺走了其21岁的生命。在其生前,周报发表过他的《南来诗钞——津浦车中杂诗》、《祷告》、《彷徨》、《二次的祷告》等。胡适认为“他于文学颇有天才,作白话新诗颇有成绩。所以我也不拘束他,随他性之所喜,浏览文学。”<sup>⑥</sup>胡适对诗坛一颗新星的陨落极为惋惜,周报分两次刊登了胡思永六首遗诗,胡适短序称,“他的诗大都可诵,有一些竟可说是近日新诗

界的上品”。<sup>⑦</sup>汪静之是胡适的同乡,小胡适11岁。汪说,1921年冬他把《蕙的风》诗稿寄给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希望出版,但“被搁置拖延,不敢决定出版一个中学生的诗集,我函请适之师写序推荐,书商才决定出版。如没有适之师的推荐,‘五四’新诗坛就没有《蕙的风》。”<sup>⑧</sup>次年《蕙的风》出版,胡适为之撰写的书序在周报上发表,给予很高的评价。汪静之在《蕙的风》中凭着对爱情真挚、热烈的向往,写出了许多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很“出格”的热辣辣的诗句,引出一些“道学家”义愤填膺、“上纲上线”的声讨。鲁迅、周作人出于对新文化运动的捍卫,站在汪静之一边,撰文支持《蕙的风》。<sup>⑨</sup>汪静之说,“在新诗的写作上我得到‘五四’新文坛最受尊敬的三大名家的指教、鼓励、保护,三大名家都是我的大恩人。……一个20岁的青年,出了一本诗集,得到大名……我可谓‘一登龙门,身价十倍’。”<sup>⑩</sup>

周报诗作品的题材、体裁和写作风格比较多样化。那时的胡思永陷入了单相思,诗作有的反映苦闷、消沉和失望的情愫,如《寄君以花瓣》。反映寻常生活小片段的,有何植三的《农家杂诗》等。何诗真挚清丽,一首是:“雨下得多日了,/人真闲呢;/乡下一点没东西,/炒罗汉豆吃吃罢。”<sup>⑪</sup>朱自清在1922年4月间的《短诗与长诗》文中批评短诗流行着“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sup>⑫</sup>但起码何植三的诗与此是不相干的。抒发进取向上人生观的,有陈衡哲在周报第30期发表的《三峡中的扬子江》。作者航行于湍急的三峡江段,尽管险象环生,但后退却绝无出路,于是“我决意舍弃了一

① 陈从周著、陈子善编《徐志摩:年谱与评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② 《徐志摩全集》(8),附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徐志摩全集》(4),诗歌。

④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⑤ 王凤编《废名集》(6),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胡适日记全编》(4),第12页。

⑦ 《努力周报》(影印本,下同)第49期,第4版,岳麓书社出版社1999年版。

⑧ 飞白、汪素平编《汪静之文集》(回忆·杂文卷),西泠印社2006年版,第75页。

⑨ 《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周作人散文全集》(2),第581页。

⑩ 《汪静之文集》(回忆·杂文卷),第76页。

⑪ 《努力周报》第23期。

⑫ 《朱自清经典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切，独自的努力向前奔”，最后“大家拍手叫着：‘好了！出了峡了，阻力打到了！’”堪称周报上胡适的《努力歌》、《后努力歌》唱和之作。周报的诗篇幅不等，徐志摩的诗一般较长，有的多达七八十行，一般的也有二三十行。朱自清在肯定长诗“尤能引起深厚的情感”的同时，也为“长诗底创作实在太少”而深感担心。<sup>①</sup>徐志摩长诗的应有价值不言而喻。周报译诗仅刊登过两次，一次是周作人的《石川啄木的歌》，包括诗论和诗，诗共17首。一次是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合译的英文短诗《我的心》。与绝大多数新诗长短句不一的风格相比，讥嘲北京当局拖欠教员工资题材、署名“W”的《索薪歌》，七字一行，计72行，不讲求韵脚，中间也不分段。从通俗角度看是新诗，从齐整的字数看则更接近乐府诗。诗作品多姿多彩，呈现兼蓄、包容和大度的气象，就像胡适在周报第21期《〈蕙的风〉序》所说：“四五年前，我们初做新诗的时候，我们对社会只要求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现在这些少年新诗人对社会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为社会的多方面的发达起见，我们对于一切文学的尝试者，美术的尝试者，生活的尝试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尝试的自由，这个态度，叫做容忍的态度。容忍上加入研究的态度，便可到了了解与赏识。社会进步的大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

### 三、诗论的新探讨、新收获

周报就新诗理论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有的是对文学革命关于新诗主张的重申，有的是其进一步深化，还有的属于另辟蹊径的创新。有关探讨主要体现在胡适的《评新诗集》。

关于新诗理论的探讨有些是在诗友中进行的，没见诸于报端，但对中国新诗发展却影响深远。据胡适1923年9、10月间的日记，他在杭州烟霞洞疗养期间与徐志摩有过多次交谈，其中一次最为惬意：游西湖后宴饮，酒后胡适、朱经农、徐志摩三人到湖心亭，躺在石板上赏月聊天。接下来，又到平湖秋月，“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的身上，月亮正从两颗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sup>②</sup>诗人之间诸次交谈都涉及些什么内容呢？胡适日记：“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我主张‘明白’‘有力’为主要条件；志摩不尽以为然。他主张massively [雄伟、庄严] 是一个要件，但他当时实不能自申其说，不能使我心服。”<sup>③</sup>胡适认为徐发表在周报上的《铁桥歌》并不成功，“成绩实不甚佳”。之后徐志摩

连续带给胡适两首新作：《灰色的人生》，刊于10月21日周报；《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刊于11月1日《晨报·文学旬刊》。这两首诗给胡适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对《灰色的人生》“大赞叹”，“志摩寻着了自了！”胡适认为徐的“天才与学才都应该向这个新的，解放的，自由奔放的方面去发展。《铁桥歌》时代的枷锁镣铐，至此才算打破”。胡适为《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的“气魄伟大”而高兴：

“此次《天宁寺》一诗，他说也是因为我赞叹《灰色的人生》，他才决定采用这种自由奔放的体裁与音节，此诗成绩更胜于《灰色的人生》，志摩真被我‘逼上梁山了’了！”胡适非常希望中国新诗在形式上有一个新的大突破，并对志摩抱有厚望：“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余人的成绩更不用说了。我很希望志摩在这方面作一员先锋大将。”<sup>④</sup>

徐志摩改写了中国新诗的历史，胡适又是给他以影响的人。胡、徐的对话，也显示出胡适诗论值得重视的倾向。文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胡适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的几十年中，诗理论没什么变化，始终看重“明白清楚主义”这一标准。梁实秋说：“近读胡适文存中有有关论诗之作，我觉得胡先生的意见前后几十年间一以贯之，很少变化。这大概也就是胡先生的坚定不移的性格之一例证，一有所见，便终身许之。”“尝试集以后，胡先生自己没有多少作品，即便偶有所作，也不离尝试集的作风，论诗的标准也依然未变。”<sup>⑤</sup>其实，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胡适在“明白清楚”的大前提下，仍在思考和丰富新诗理论。徐志摩以《灰色的人生》、《天宁寺》二诗，让胡适接受、服膺了与“明白”、“有力”之外的“雄伟”、“庄严”标准。胡适对这两首诗“自由奔放”的定位，是与“明白清楚”平行的另一着眼点。

周报第51期刊登徐志摩的诗论文章《坏诗，假诗，形似诗》，徐从社会的好人、假人和不中用的人说开去，认为诗也可以分出好诗、假诗和坏诗。徐认为，“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坏诗是指作者艺术实力欠缺，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品如

① 《朱自清经典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②③④ 《胡适日记全编》（4），第80、82、82~84页。

⑤ 梁实秋：《胡适之先生论诗》，《梁实秋怀人丛录》，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

同早产儿,“不全死也不免残废”;假诗是“剽窃他人的情绪与思想来装缀他自己心灵的穷乏与丑态”。从审美效果来看,坏诗因其“不纯粹的艺术”,读者更容易产生“好意的怜与笑”;假诗的坏处就大了,因为其不诚实,“动机却只是诈欺一类,仿佛是清明节城隍山上的讨饭专家……不由你不感觉厌恶”。徐对诗的分类符合诗界实情,比喻也很生动。他委婉地把胡适的“尝试”体比作“坏诗”,因为胡适跟他讲过此类体裁的诗“作孽不浅”,“诗坏是无可讳言的”。但徐志摩并不因诗废人:“但总还好,他们至少是诚实的。”说到现实生活中的“假诗”,徐志摩举了郭沫若诗《重过旧居》:“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泣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其实,“泪浪滔滔”是无可挑剔的。夸张,是诗的表现手法。时为日本留学生的郭沫若为养家糊口,奔波于上海和福冈之间。回到福冈后,已属他人的旧居叮叮当当正在装修,新住处家徒四壁,“头发很长”的大儿子孤零零一人在院落里挖土。张望之间,郭妻带着小儿子从外边回来。穷困凋零、聚散离合,令郭沫若悲情汹涌,“那时候的眼泪真是贱,种种的往事一起袭来,便逼得我‘泪浪滔滔’了。”<sup>①</sup>“泪浪滔滔”是形容泪水奔涌的一种创新,人们情理上可以接受,在夸张的程度上与“雨骤”差不多,但后者是老掉牙的套路。郭沫若因此评论而大动肝火并非在意被批评不擅长夸张手法,而是恼火“假人”的影射。徐文的积极意义在于提出了新诗夸张“度”的问题,但把做诗和做人轻率放在一起谈论,容易伤人。

办周报之前胡适的几篇诗论,如《〈尝试集〉自序》、《谈新诗》、《〈尝试集〉再版自序》等,较少直接涉及到“含蓄”的话题。《〈蕙的风〉序》和《评新诗集》则谈到了“含蓄”。《〈蕙的风〉序》指出,必要的含蓄还是应该讲的,“古人说的‘含蓄’,并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过一层,反觉得直说直叙不能达出诗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脱略枝节,超出细目,抓住一个要害之点,另求一个‘深入而浅出’的方法。”胡适没有“明白清楚”与“含蓄”之间画出壕堑,他不排斥含蓄,他把运用精当的含蓄奉为境界。胡适对新诗音节的认识也在深化。《〈尝试集〉自序》曾认定:“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

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sup>②</sup>显然胡适此时掌握的这个标准还嫌笼统,因为“话”毕竟有简洁、啰嗦和顺畅之别,“自然音节”也缺乏把握的尺度。所以《康白情的〈草儿〉》对康关于音节的看法连连叫好:“白情的诗,在技术上,确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说:‘总之,新诗里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这一层,初看起来似是很浅进,很容易,所以竟有许多诗人‘鄙漂亮而不为’!但是我们很诚恳的盼望这些诗人们肯降格来试试这个‘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康白情承接并发展了胡适的音节理论,使得“自然音节”的标准更明晰了,胡适则接受了这个“发展”。

#### 四、译诗及民谣

周报刊登过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翻译的英文诗《我的心》(作者 Sara Teasdale)。任、陈具有多年留学美国的经历,陈是一位有才情的诗人,任在美国时就很关注文学革命,并就此话题与胡适有过多次书信的探讨。可以说,任、陈英诗汉译的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周报还选登过汉译日本短歌17首并一篇评介文章。译者的权威性,有助于保证译诗的准确性和影响力。事实上,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自文学革命兴起后便一直为人所强调。傅斯年1919年在《新潮》期刊撰文《怎样做白话文?》,几乎把白话文的出路完全寄托于“西洋化”:“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模仿它,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方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sup>③</sup>他强调要“使用西洋修辞学的手段”,对有价值的西洋文章,要“用直译的笔法去译它”,正式做文章时要运用“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务必“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sup>④</sup>按着这个标准,被广为称颂的严复的翻译在傅斯年眼里一钱不值,堪称“子书的笔法、策论的笔法、八股的笔法……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究衣服,真可说是把我之短,补人之长”。<sup>⑤</sup>胡适留学美

① 郭沫若著《沫若自传》(上),求真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② 《胡适全集》(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

③ 《傅斯年全集》(1),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④⑤ 《傅斯年全集》(1),第135、136页。

国时养成的译诗习惯也基本上没有间断。鲁迅曾建议汪静之多读拜伦、雪莱、海涅的诗。<sup>①</sup>上世纪20年代初短诗大行其道，“那时写小诗，一方面是翻译过来的日本的短歌和俳句的影响，一方面是印度泰谷尔诗的影响”，“冰心女士的小诗，作者自己说明是受泰谷尔影响的。”<sup>②</sup>但同时，也有人对新诗欧化倾向持异议，闻一多1923年发表《女神之地方色彩》，很反感地指出，“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底狂癖，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底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做成完全的西文诗……《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sup>③</sup>他不客气地批评《女神》“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sup>④</sup>“最明显的缺憾那便是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sup>⑤</sup>。新诗翻译中的质量问题，也应该是周报重视译诗的一个背景。闻一多在1923年5月撰文订正郭沫若从英文转译波斯诗人鲁拜·伽亚谟作品中的错讹，胡适也就此事致信郁达夫建议“多用几个本子作考据”。<sup>⑥</sup>为了译诗能有更多的借鉴和参考，周报还有更多的考虑。第49期刊登了徐志摩的《杂记》，徐表示“早已想做一种西洋诗话，记述西洋人有趣味的逸事，他们各个人的概念，以及他们各个人砥砺工具的方法。我想他们有时随意说出来的话……都是他们随意流露的真心得，虽则不是长成的木料却都是适之比况杜威的Creative Seeds（创造性种子——引者注）。这些灵活的要你有点适当的心田来收留培植就会发芽生长。”这样一本书如果能够写成并出版，也应该算是对译诗理论的一大贡献了。我们有理由说，周报的译诗是有很强针对性和现实性的，旨在推动新诗事业更好地成长，而系统讨论译诗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只可惜，周报没等这项工作深入进行下去便停刊了，所以刊出的译诗较少。

刊布、介绍和研究歌谣，也是周报一项重要内容。1917年时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由刘半农主持，一改

歌谣“为文人士所不屑道”<sup>⑦</sup>的风气。在胡适看来，歌谣是诗歌的重要素材，他在《读书杂志》第2期《北京的平民文学》中赞赏晚清意大利驻华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针对中国民间歌谣所说的：歌谣中间有“真诗”，“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胡适敏锐地指出，“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罢。”为了发掘和利用好歌谣这一珍贵资源，胡适还在周报第31期《歌谣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中说，许多歌谣看起来大同小异，有的搜集者图省事，仅将其中自认为好的选择保存下来。胡适指出，这个做法是很不科学的：“第一，选的人认为最好的，未必就是最好的。第二，即便他删的不错，他也不免删去了许多极好的比较参考的材料。”周报重视外国歌谣，第20期上刊登了周作人选译的日本“俗歌”，计20首。由歌谣也可看出，周报上的新诗建设是有通盘考虑的。

本文作者：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 俊

① 《汪静之文集》（回忆·杂文卷），第61页。

② 《废名集》（4），第1725页。

③④⑤ 《闻一多全集》（2），第118、119、120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页。

⑦ 顾颉刚：《吴歌甲集·自序》，《顾颉刚全集》（14），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页。

## *Endeavor Weekly and the Free Vers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Shen Yi

**Abstract:** Engaged in criticizing politics and driving free vers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forward as well, *Endeavor Weekly* was energetic in supporting new writers; publishing poems with a variety of topic, type and style; probing into poetic theory; and putting emphasis on exploring poetical elements in poetry translation and folk songs. *Endeavor Weekly* took a vital and unique po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of the free vers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Key words:** *Endeavor Weekly*; free vers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Hu Shi; Xu Zhimo; poetry translation; folk song